

Andrzej Wajda

Autobiografia

剩下的世界

瓦伊达电影自传

[波兰] 安杰伊·瓦伊达 著 乌兰 李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Andrzej Wajda

Autobiografia

剩下的世界

瓦伊达电影自传

[波兰] 安杰伊·瓦伊达 著 乌兰 李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剩下的世界：瓦伊达电影自传 / [波兰] 安杰伊·瓦伊达著；
乌兰，李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6
ISBN 978-7-5426-6650-5

I. ①剩… II. ①安… ②乌… ③李… III. ①瓦伊达
(Wajda, Andrzej 1926-2016) —自传 IV. ① K851.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4333 号

剩下的世界：瓦伊达电影自传

著 者 / [波兰] 安杰伊·瓦伊达

译 者 / 乌 兰 李 佳

责任编辑 / 职 焯

策划机构 / 雅众文化

策 划 人 / 方雨辰

特约编辑 / 曹雪峰

装帧设计 / 孙晓曦 (pay2play.design)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成逸洁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楼 6 层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1/32

字 数 / 276 千字

印 张 / 9

书 号 / ISBN 978-7-5426-6650-5 / K · 524

定 价 / 59.8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39-2925659

再版前言

当标志出版社在我的自传出版十三年之后，决定再版此书时，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十三年间，我的生活中都发生了哪些事，什么事值得我为此书续写再版前言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那就是我追回了我父亲的剑。1939年秋天这把剑被埋在了我们在拉多姆¹住房的院子里，当时我认为，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把剑。不过巧合的是，在我拍摄《卡廷惨案》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把剑失而复得了，实现了我对父亲雅库布·瓦伊达的承诺。我父亲是在1940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²的人在哈尔科夫³杀害的。

这双重的回忆促使我回到《剩下的世界》这本书。我再次翻看过去的日记，往事又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我回忆起，除了电影《卡廷惨案》里再现了苏联刽子手杀害波兰军官的血腥场面以外，在十年前拍摄的两部电影《复仇》和《甜蜜的冲动》中，我也曾用历史题材向观众展示过类似的场景，比如在电影《复仇》中，我引用了亚历山大·弗莱德罗⁴的诗句；在《甜蜜的冲动》中我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生活的悲剧，这在我长期的电影导演生涯中是十分罕见的，同时也为我的电影开辟了新的篇章。

后来我发现，在我告别比较程式化导演手法的阶段之后，也就是在不久前，在我的《素描一生》画册出版之后，我意识到，我的艺术生涯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我结束了电影《瓦文萨》的拍摄之后，我认为我应该为自

1 波兰中东部的一个城市，1934年瓦伊达随父母迁居此处。

2 指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3 位于乌克兰东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与苏军在这座城市附近发生了四场战役，也是苏军杀害波兰人的地方。

4 波兰浪漫主义时期戏剧作家、传记作家和诗人。

已三十多年的导演生涯做一个总结，我想，这件事情不只是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因此我决定再续写三个章节。我亦回想起在法兰西学院替补费德里科·费里尼¹的席位时，那种让人感到荣幸的心情和令人激动的场景，我应该为他专门撰写一个章节。

此后，我每天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本我的犹太同龄人写的回忆录，他也曾在拉多姆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时他家离我家只隔了几个街区，而他却为我揭开了一个令我感到十分陌生的世界，于是我决定，要在关于童年的那一章节里补充些资料。既然我在文章中会提到我在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学沃依切赫·马尔柴夫斯基²，那么就应为罗兹电影学院专门写一个章节。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专门采访了杨·诺瓦克-耶尤兰斯基³，请他评价一下华沙起义⁴，因为我最早的设想是用完全不同的手法再现波兰电影学院的实况。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后来我又回想起一件事，这与撰写新的章节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对以前所写的所有章节都根据新的情况加一些新的补充。

过去的事情已经相距我们很遥远，虽然当时我还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孩童，但是父亲的剑被埋在地下这一情景一直印象深刻，仿佛就在眼前，这一切促使我比较早熟。

2013年7月14日

写于斯彼得克维兹

1 意大利著名艺术电影导演、演员、作家。

2 波兰电影导演、剧作家。

3 波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记者、国家军战士。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起义从1944年8月1日开始到1944年10月2日结束，起义失败。

首版前言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对我的朋友讲述过书中所写的故事。不过我只是描述了关于这些故事的简单情节，不管大家的反应如何，我还是尽量避免误导大家去过多地渲染故事的情节。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既不能撒谎，也不能胡编乱造。为此我当了导演而不是编剧，因此我一生都在努力让我的电影或者戏剧更接近事实。

我注视着床上方挂着的——自我幼年起就一直陪伴着我的——守护天使的画像浮想联翩；之后我又看着我在克拉科夫的一个古董店买到的一幅仿制沃依切赫·克萨科¹画的利沃夫青年保卫战士的油画，其实我曾在学校里见过这幅利沃夫青年保卫战士的油画，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这幅画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而后我又凝视着阿尔图尔·格罗特格尔²的那幅题为《森林》的油画，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因为我突然想起，我早年在祖母位于普舍梅希尔³的家看到这幅画时的情景，那时这幅画斜挂在墙上，下面放着一本安东尼·波托茨基⁴的书，这幅画在煤油灯的照耀下显得十分阴森。现在在我家收藏的油画中，还有两幅塔戴乌什·科希丘什科⁵和尤瑟夫·毕

1 波兰画家。

2 波兰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画家之一。

3 波兰东南部的一座城市。

4 波兰作家，文艺评论家。

5 波兰军队领导人，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的民族英雄，担任国家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领导了反抗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科希丘什科起义。

苏斯基¹的肖像画。

童年时，我是个非常普通的小孩，父亲教我学骑马，守护天使的画像一直护佑着我前进的每一步，可母亲却一直担心我会因学骑马出事，后来她又得知我在1942年参加了波兰国家军²，我发誓要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也许因为觉得太过神圣，所以我们从来不在家里大声谈论此事。

尽管处在战乱的年代，但我仍旧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其中尤瑟夫·查普斯基³的《关于塞尚与绘画意识》一书令我终身难忘，是这本书打开了我通向艺术世界的大门，使我认为自己是当时拉多姆地区最具现代派艺术风格的画家。当时的艺术家们认为我的这些画作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这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这样，我自己还会时不时拿出这些画作欣赏一下，每看一次我都能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是谁抚育我长大成人？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具有传统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军人，父亲总是军容整齐；其次是我的学校——那是一所具有希腊和罗马文化传统的高中；第三就是天主教教会——让我懂得神圣的教规。我带着这种爱国主义道德观经历了1939年爆发的战争。我看到了什么？我没必要去讲战争的故事，但我可以说战争的结果是——谎言战胜了一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切政治反对派，而且还要摧毁整个民族。当时唯一的艺术形式就是能看到胜利者们举行的军事游行和为此所做的宣传广告。我明白了罗马法和地中海文化的价值失去了意义。我真的必须屈服于这一切？是否可以通过担任电影导演而规避这所要经历的一切？

生活就像剧院中一出无聊的戏剧，不过不必急于在演出还没结束时就脱离剧场。我曾经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在1946年，我无意间闯入了位

1 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1922）、“第一元帅”（1920年起）和独裁者（1926—1935），他还是波兰第二共和国的领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起，他成为了波兰政治中的主要力量和欧洲政局的重要人物。他被认为是让波兰在1918年重返独立的功臣。

2 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德国进行抵抗运动的一支波兰军队。1942年2月从反抗组织“武装斗争联盟”中分离成立，并在未来两年中吸收了大多数的波兰抗德势力。成为支持波兰流亡伦敦政府的反抗组织中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3 波兰画家、作家。

于克拉科夫自由广场安全局所在的地下室，经历了数小时不间断的审讯，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就是，我是否参加过国家军。最终审讯我的年轻人累得头靠着桌子睡着了，而在他身边半开着的抽屉里放着一把手枪。尽管审讯我的地方是在五层楼上，但渴望自由的欲望一直在心中燃烧。不过在被审讯数十个小时之后，我仍然静等着天明。盼啊盼，最后自己也不知道在期盼什么。也许是出于好奇心，想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也许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个经过内务人民委员会严格训练的年轻审讯官是在装睡。在被审讯的那些天里，在安全局的走廊里，我一直能听到那些企图加害我们的俄国顾问们说俄语的声音。

童年时的我十分胆小怕事。那时我特想进教堂唱诗班，但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尽管那时我已经会用拉丁语背诵大段大段的歌词，可是我又害怕在神父问我话时会忘词。后来我当上了拉多姆童子军副队长，当轮到我值班，站在所有同学的队列前时，我却不知该怎么下命令喊话。这很奇怪，我是在军营里长大的，每天都能听到军营中军人高声呼喊口令、命令的声音，时常能听到没头没脑大声教训别人的声音。而自四十五年前我从事导演这个职业开始，我也在不停地下着各种命令，其实不管什么都是可以学会的。

在我的青年时期，我一直坚信，世界会变得更好。20 世纪的电影艺术就应该为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懈努力。我们曾经相信，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以及各个大洲的人们都会通过电影彼此相识，增进了解，彼此成为朋友。不过看起来世界病得并不轻，尽管孩子们总是给它提供新的玩具，但也无法治愈它。每天晚上在电影院里都会放映新的电影，但是信念却在消失。随着信念的消失，世界知道自己犯了错，希望自己能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

如今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够完全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我属于观看老的传统电影的那一代人，于是我总是尽量想让观众们去理解别人。萨特曾说过，别人就是地狱，我把这句话理解成文学的隐喻，也就是说，别人和我就是力量。我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电影艺术是要把人引向创作的神秘感当中，而观众只不过是导演艺术手段的添加剂的观点。

电影就像蝴蝶的生命那样短暂。要想了解电影的成功或者失败，就必须

先了解它的环境，也就是伴随电影生成和最终搬上银幕的过程。首先电影的生命取决于观众的反应和制片人以及评论家的评价。之所以准备出版瓦伊达电影画册，那是因为在波兰国内外有很多人在评论我，于是我就琢磨，是什么赋予了我力量，让我在拍了一部电影之后还想继续再拍下一部，既然拍了那么多电影，哪部电影更有价值呢？为什么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拍了那么多电影而感到欣喜若狂呢？我只能给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我从来不看那些影评。在我拍摄电影《地下水道》时，我患了十二指肠溃疡，医生限制我，让我尽量少做剧烈活动，当时我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再拍电影，要么不要去关注影评家的评论。诡异的是，我选择了后者……

十几年前，在我拍摄《信用与借贷》这部电视电影的时候，我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一次盘点，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得与失。我认为，我的所失就是永远没有自己的时间，也许只有过一次。在我拍摄电影《白桦林》时，曾抽出时间欣赏过拍摄场地附近的自然风光。遗憾的是，我不仅没有时间观花赏叶，甚至也没有时间看看或者关注一下周围的人，看来我对友谊的维护是过分地敷衍了事了。在今天看来，这肯定是无法估量的一大损失。

也许在某个时刻，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就后便应当激流勇退，也许成功就藏在某一处，也许并不是那些观察我们的人能决定我们的成功，而成功取决于我们自己。今天我还不大可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够好，是否还待在应该待的位置上，是否帮助了应该帮助的人。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生活一直处于动态中，我一直在行动，不过是否该选择某时刻问自己：“这种想法是否正确？”这种不安的阴影一直伴随于我左右。

现在再来看看，我都“收获”了什么？可以说我对自己拍摄的某几部电影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几部我认为比较满意的电影获得了比我的其他电影更高的评价，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对它们有很好的评价。这些电影是在恰逢天时地利的时刻拍摄完毕的。比如电影《铁人》，我也可以等到获得更多自由的时候拍摄，但我开拍了，可我从来没想过要拍一部杰作，这是我应该给自己点赞之处，也许这就是我该走的路，即在拍完一部电影之后紧跟着继续再拍电影，在几部电影之中总能挑选出一部是有价值的。

1981年12月13日，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很难预料这一冲击带来的后果。那时我们只知道，要建设一个良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走改良道路，这非常符合波兰人的特点，但这在波兰却成了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是否还需要竭尽全力拍摄表现更加自由的电影和撰写追寻真理的书籍呢？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全盘否定那个年代。因为我们曾用我们的笔，我们的电影表现和反映了波兰人的心灵、精神和渴望，我们应该感谢自由，一直在隐蔽地等待着，等待着正确时刻的到来。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很多次与幸福相遇，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我会束手无策的。我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念，这并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是能证明，我这个人有极强的好奇心，总想知道今后会怎样，自愿要做的事情总是很快就做完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随处令人感觉到的沮丧……无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时期我犯过怎样的错误，我遇到过怎样的困难和束缚，我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工作，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生命。

在我撰写这本自传时，我一直都在不停地翻阅我坚持多年写下的日记。在我的日记里，记录了许许多多围绕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我拍摄的某些电影曾打动过观众、曾激起过他们沉睡中的需求和情感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我也有过与他们一样感同身受的经历。

1	波兰骑兵
6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我们干什么
23	战争刚刚结束
37	画吧画吧，你怎么画也成不了马泰伊科
52	回顾罗兹电影学院
64	塔戴乌什·沃姆尼茨基给我上的两次导演课
71	他们能从这里明白什么——回顾罗兹电影学院
101	你会想念我的——关于兹比格涅夫·齐布爾斯基
119	1972—1979 年拍摄的四部电影
148	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中的良知
173	神秘的“X”和“道德焦虑”
184	梦想更动人（未完成的电影）
200	费里尼的座椅
208	自由之花——从京都到克拉科夫
219	走向光明
236	2002—2009 年拍摄的三部电影
256	“演员们来了”——告别戏剧舞台
263	素描一生
270	我再也拍不了的一部电影

我们不该这样分手，
这是从未有过的沉重告别；
你给我带来尊严，
我答应要为你送终。
我将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心情，
每当想起我在你身上骑行时，
享受到的那些自由时光
所想之事都已如愿以偿。
部队驻扎在普通的军营里，
我无法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因此在想念你时，我的心在颤抖，
不能长吁短叹，不能放声大哭！

——杨·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¹

无论到什么时候，如果我想拍一部自传电影的话，电影的开头一定会是一个雾气笼罩着的朦胧的静止画面：一轮冉冉升起红太阳，照耀在苏瓦乌基市²的科希丘什科大街上；煤油灯昏暗的光在城市公园里忽闪忽闪地亮着；

1 波兰巴洛克时期传记作家。

2 波兰波德拉谢省东北部的一个镇，邻近立陶宛边境。

夏日的一天，人们正在为一位在训练中牺牲的战士举行葬礼；5月3日¹波兰军队第二骑兵团参加阅兵仪式；我们家里的铁炉在冬日里烧得火热；冬天的夜晚第四十一兵团正在准备整装待发；一切都像梦中的远景……

遗憾的是，我很快回到了现实：开学的第一天，早上八点。严冬，窗外一片漆黑，第一节——数学课。我被叫到黑板前，下意识地用左手拿起了粉笔，我是左撇子，但是我知道写字必须用右手。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最重要的一课。我是个墨守成规的人，至今仍用右手写字，因为必须得这样，不过我画画却是用左手，我也必须得这样，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度过的。可奇怪的是，这种对自己的强迫并没有丧失我个性的存在。

我曾有过更糟的境遇：在孩童时期，我总是不停地感冒，常常独自坐在窗前，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孩子在外面欢快地玩耍。我与现实生活比较脱节，但也促使我与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造就了我多愁善感的性格，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一名电影导演。

《三姐妹》的电影拍完了，我时常因被电影中的故事所打动而泪流满面。我不是为影片中主人公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步兵团从一个省的小城市撤军而流泪。也许这是由于我曾经亲眼见过这样的军队和这样的小城市。

我出生在苏瓦乌基市，那里除了有我父亲担任炮兵排长一职的第四十一步兵团，同时波兰军队第二骑兵团以及立陶宛军队第七骑兵团都在那里有驻军。这两个骑兵团被统称为鞑靼骑兵团，因为他们是从立陶宛骑兵旅分离出来的。这两支部队有上千人，正是因为有这些驻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座城市才充满了活力。战后几十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座城市，这里已经没有任何驻军——因为不需要为维护我们与苏联兄弟的情谊而战斗了——这座城市变得毫无生气。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张军队在操场上练兵的照片，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张人们挥着矛和刀剑练兵的照片。我一直非常佩服军马，它们比战士的

1 1791年：波兰立陶宛议会通过著名的《五三宪法》。

服役期还长。相比骑兵们，它们甚至能更好地理解和区别军号发出的各种命令。遗憾的是，当它们驮着挥舞刀剑的骑兵快速奔跑时，这对马匹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那些没有经验的骑兵朝着前方挥舞刀剑时，有时险些把马的耳朵割掉。军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停地训练，1920年他们还可以战胜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但是到了1939年，他们已经没有战胜德军的可能了。

他们过去的训练是为了参加面对面的厮杀，而格斗实力决定着战斗的胜负，那时要么靠人多取胜，要么靠强悍取胜。今天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战争代替了过去那种时不时需要动用冷兵器的战争，而现如今甚至这样的军队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亲眼见过具有光荣传统的波兰骑兵退出历史舞台的场面。那时我还结识了一名骁勇善战的骑兵，每当我想起他讲的故事的时候，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下来。他是骑兵上校，叫卡罗尔·罗麦尔。他在位于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军校接受过训练，还是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作为参加过1914—1918年对德战争的俄罗斯军官，他具备讲故事的特殊口才。他讲的故事总能让我们心惊肉跳。在我们一起拍摄电影《白色战马》时，他是我们的顾问。有一次，上校看见我们办公室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于是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接到命令去追杀十七个德国步兵团的逃兵。”然后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又继续说，“你知道吗，我的手没有受伤，不像我的那些同事，第二天他们的手都快废了。是自行车救了我。”他接着说，“在接到命令前，我用刀从自行车胎上割下来一块胶皮，然后用这块胶皮裹着手用刀去砍杀敌兵，所以我的手没受伤。”

这位上校还说，有一次他在骑马追击敌人时，从后面连续三次砍了逃兵的脑袋，最终把他的脑袋连头盔一起砍了下来，后来发现每次砍到的部位都只差不到一厘米。所以我们在《白色战马》这个电影中，看到扮演神父的演员的一些动作，他在骑马时在马鞍和膝盖之间放了硬币袋，而且一直夹得很紧，没有掉下来，动作难度很大。骑马真是一门高超的技艺。

这些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剩下一些由国家管理的骑兵队的某些领导还在，因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还保留了这些已经撤销了的骑兵团

的番号。现在也只是为了拍电影还保留着一些骑兵专家、设计骑兵服装的顾问和几个军马场。

随着骑兵部队的撤销，那些威武雄壮的、骑着高头战马的骑兵也随之消失了。在历史上战功赫赫的、令人充满幻想的骑兵曾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每次去纽约，一定要去参观纽约弗利克艺术馆¹，我会久久地伫立在波兰骑兵的画像前，上面画的是来自查尔涅茨基²骑兵部队的战士。这是伦勃朗的画，我们智勇双全的帕塞克为这幅画写下了动人的诗句。画中有一匹立过多次战功的马，它守卫着这个大厅，讲解员每次给我讲解这幅画时，总是让我注意骑在马上的年轻人有六根手指，而我看到的却是这幅画面的另一点：一位年轻骑手，他骑在天生具有野性活力的骏马上，生气勃勃而又快乐的形象。伦勃朗的这幅画好像是站在马鞍的高度来画的。奇怪的是，画家在画骑马人的形象时，通常是从马下面的角度画，这样画出来的形象从正面看非常高大。而伦勃朗这幅画上的马却是四脚坚实地踏在地上，好像在随时准备着迎接一切。

有些人说，这幅画实际上展现的是一个浪子离开祖国的形象。但愿如此，因为我还记得，伦勃朗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的其他一些画，那里有一幅画叫《浪子回家》，画面上是一个穿着破衣烂衫，赤着脚的儿子，跪在圣父脚下，完全看不到战马、刀剑、弓箭、权杖和作为骑兵的自豪感。

我亲眼见过骑兵们在冬夏两季训练时骑在马上骄傲地行军的情景。见过他们在国庆节接受检阅的场景，还见过在德军完全占领我们国土之后，他们最后一次在拉多姆列队行走的场面。1939年10月的一天清晨，妈妈接到消息说，德国人要把驻扎在军营里的第七十二步兵团的军官运到德国的战俘营去。

那次看到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走在队伍前排的是将军，他们身后是排成一行行走的八位陆军上校，我记得特别清楚，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

1 The Frick Collection，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一座艺术博物馆。

2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将军和贵族。波兰王国王冠领地陆军指挥官。他被视为波兰民族英雄。

势。骑兵队的军官们穿着拖到脚踝的长大衣行走着，他们都尽量保持军容整齐地往前走，有的人身上还缠着绷带。他们战后回到家乡，万万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在上帝把他们收到自己怀抱之前，他们要去战俘营遭受苦难，承受羞辱。就像伦勃朗《浪子回家》画像上画的那样，波兰骑兵骄傲地出征作战，而他们现在又离开了一切都落后于 20 世纪的祖国。

我和母亲跟随着行进的队伍，尽量走在显眼的地方；母亲希望有人能认出她来，告诉我们父亲的下落。她没能等到这一时刻；多年之后，也就是在 1989 年 12 月，从一位叫耶日·奥奇敏科夫斯基目击者的记录中，我才得知了我父亲在 1939 年 9 月的遭遇。

1939 年 9 月 18 日雅库布·瓦伊达大尉作为指挥官和莱昂·科茨上校率领的一个行动小组，从波兰南部小城科夫拉出发，在 9 月 20 日凌晨来到了波兰东部卢布林附近的乡村霍罗德莱，越过了布格河，在这之前他们还跟乌克兰的小部队发生了几次冲突。在穿过卢布林市时，还跟德军的一个机械化部队在卢布林附近的小村庄波利赫纳打了一仗；大尉瓦伊达指挥自己的部队从左翼打击了德军，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时分。第二天傍晚，波兰部队又在德日沃拉地方与苏联坦克团发生了交战。10 月 1 日中午坦克团包围了莫莫迪地区，要求波兰人投降。

当科茨上校宣布了苏军要求波兰人投降的命令时，耶日·奥奇敏科夫斯基的记录里写道，“瓦伊达大尉突然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起来。”“他是一名指挥官，他不是下令让别人冲锋陷阵，而是自己带头冲锋在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平易近人，十分关心照顾战士们，他虽性格很温和，但非常勇敢决断，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军官。”

苏联指挥官对科茨上校很不满意，说他指挥了反抗苏联坦克团的战斗，上校回答说，我们是为了保卫波兰的领土，而苏联指挥官却说，现在我们是这里的主人。上校反驳道，命运与机遇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帝会创造奇迹。“波兰军士懂俄语，但他说，他翻不出最后一句话（也许他不想翻译出来）。”在这个目击者的记录里还写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站在瓦伊达大尉身旁；之后，我们就被按军衔等级分开了。”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我们干什么

安杰伊：我们还活着。

马切克：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呀，安杰伊！

安杰伊：你害怕啦？

马切克：是啊，我们有过多少同事啊！那时候有多少好小伙子 and 好姑娘？

安杰伊：那又怎么样？不也全都牺牲了吗？

马切克：真希望还能跟他们在一起呀！

安杰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比他们年轻。

马切克：不只是年轻吧。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安杰伊：我们知道，他们想要我们干什么。

马切克：就算如此吧。你发现他们想要我们干什么呢？想要我们去死吗？那也好，我们会去死的……

安杰伊：你别犯傻了！

——电影《灰烬与钻石》片段

当我在电视的晚间新闻里看到，在科威特或者贝尔格莱德夜晚的上空，制导导弹发出的光和两座城市遭受防空导弹的袭击时，我就在想，1939年9月，那时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无意识，在无形敌人面前的恐惧占据了一切。我们害怕尚未到来的战争，与今天相反，那时只要看到闪着大灯开过来的汽车，看到很多人朝某个方向行走时，就知道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我们根据